



明清史学术文库

明清史事管窥

王戎笙 著

故宫出版社

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



明清史学术文库

明清史事管窥

王戎笙 著



故宫出版社

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明清史事管窥 / 王戎笙著. —北京: 故宫出版社,
2013.1

(明清史学术文库)

ISBN 978-7-5134-0361-0

I. ①明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国历史-明清时代-
文集 IV. ①K248.0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308789 号

明清史事管窥

著 者: 王戎笙

责任编辑: 冯印淙

封面设计: 李 猛

出版发行: 故宫出版社

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: 100009

电话: 010-85007808 010-85007816 传真: 010-65129479

网址: www.culturefc.cn 邮箱: ggcb@culturefc.cn

制 版: 保定市万方数据处理有限公司

印 刷: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: 28.75

字 数: 368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 1 月第 1 版

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~3000 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4-0361-0

定 价: 39.00 元



王戎笙（生），湖北汉川人，1929年生。195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，次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（前身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）。历任实习员、助理研究员、副研究员、研究员、清史研究室主任。其中，1958～1967年任郭沫若同志秘书。1982年3月至1983年3月应邀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访问研究。早年研究秦汉史，20世纪60年代起转攻清史。

1983年起，主持10卷本《清代全史》，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，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～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。1998年10月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《李自成结局研究》（合著）。2005年4月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《郭沫若书信书法辨伪》一书。

学术贵在创新。有创新才有生命力。创新必须继承前人的成果，并力求超越，不能踩着前人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走。

创新需要勇气，可能有失败的风险，这就需要学术界的宽容，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讨论环境。

王戎生

2012年7月2日

总序一

2012年是清帝退位一百周年，明清史研究也走过了百余年的风雨里程。出于总结和促进发展的目的，故宫出版社将百年来明清史专题研究的重要的甚至经典性著作，遴选四十余部再版发行，以期对当前的明清史研究有所裨益，这是令人高兴和值得肯定之举。

长达五百余年的明清两代，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的王朝，既处于我国封建社会行将灭亡的衰落时期，又处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发展的巅峰时期。盛世与没落，帝王的文治武功与社会的演进变革，殖民者的“福音”传播与列强的坚船利炮，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与先进的中国人的图强探索，以及革命与改良，等等。这是一个多姿多彩且天翻地覆的历史时期。这一时期又连接着今天，影响着今天。因此，研究明清两代的历史，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现代意义上的明清历史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。面对清王朝的腐朽没落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奴役屈辱，资产阶级革命的风起云涌，以梁启超、夏曾佑、严复、孟森、章太炎、向达、谢国桢、萧一山等学者为代表的中国知识界，继承中国古代社会“鉴古知今”的历史传统，吸收近代科学理论知识，开始对清先世、明满关系、南明史、学术史，后渐扩大到秘密社会史、华侨史、晚清史（这是一大热点）、民族史、历史地理、财政史、盐业史等

明清历史的多个方面，进行系统研究，筚路蓝缕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，学术界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，继承老一辈学者的信实学风，汲取西方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，解放思想，大胆探索，推动了明清史研究的不断深入。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大，研究水平在不断提高，明清史学逐渐形成充满朝气、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。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与积淀，时间已为我们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著作，这些著作资料翔实，论述严密，条理贯通，至今仍为许多学者所推崇。因此，将多年以来明清史研究著作纳入《文库》，重新修订再版，可使我们回顾明清史学研究的发展轨迹，促进 21 世纪明清史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。

故宫博物院和故宫出版社推出这套《明清史学术文库》还有一层特殊的意义，这就是故宫和故宫博物院在明清史研究中的特殊地位。故宫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宫紫禁城，在明清两朝的统治历史中，共有 24 位皇帝在此生活执政，使之在五百多年中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，演绎出一幕幕兴衰史剧，几乎明清时期的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，都与宫廷发生着密切的联系。故宫几乎每一座宫殿、每一个院落、每一处山石，甚至每一口水井、一床一案，都有一段传奇经历，蕴含着独特的、浓厚的历史文化信息，涉及建筑、园林、历史、地理、文献、文物、考古、美术、宗教、民族、典制、礼俗等诸多学科与门类。这也是研究明清时期典章制度、宫廷建筑、宫廷生活等历史问题的专家学者不能不予以关注、不能不去考察体验的诸多社会历史领域。建立在以明清两代皇宫“原址保护”基础上的故宫博物院，兼容建筑、藏品与其中蕴含丰富的宫廷历史文化为一体，这一特点及优势，决定了它在整个明清史研究中有着独特的、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。而故宫的一切研究工作也离不开明清史学术界的辛勤劳动。

正是基于这种独特关系，故宫博物院与清史编纂委员会联合举办清史研讨会，与北京大学联合主办《明清论丛》，成立明清宫廷史研究中心和故宫学研究所，组织编纂明清史研究丛书，并资助出版一大批重要的明清史学术研究成果，受到学界的广泛赞许。以突出皇宫、皇权和皇帝等皇家文化研究的“故宫学”学术概念，也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。浙江大学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高校已开始招收这方面的硕士研究生，浙江大学成立了故宫学研究中心，南开大学成立了明清宫廷史与故宫学研究中心，台湾清华大学开设了“故宫学概论”课程等。所有这些，必将对故宫博物院的日常工作和学术研究，以及明清史学界的进一步发展，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
故宫出版社作为故宫博物院的重要部门，一直把促进明清史和故宫学的研究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，做出了积极的努力，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。本次推出这套《明清史学术文库》，在整合、出版既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，通过深入地与专家、学者沟通，对明清史及故宫学研究涉及的一些问题进行专题探讨，以提高明清史和故宫学研究的理论水平，并向成为我国明清史研究成果的出版重镇不断迈进，其精神也值得赞扬。我们相信，通过故宫出版社与明清学术界的不断努力，明清历史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发展。

郑欣淼

2012年7月

总序二

一百年前的 1912 年，清朝覆亡，宣统帝退位，中华民国建立。标志着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终结。中国历史迈开了前进的脚步，中国人民觉醒奋起，在近代化的征途上努力前进。

伴随着清王朝的覆灭，中国的一大批学者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两个王朝——明朝和清朝的历史进行了认真、系统的研究，章太炎、梁启超、孟森、钱穆、萧一山、蒋廷黻、郭廷以、郑天挺、吴晗、罗尔纲、王钟翰等学术前辈在明清史处女地上披荆斩棘、辛勤耕耘，为明清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学术界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地解放思想，积极吸收外国的研究思想和方法，使我国明清史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长足进步，涌现出一批有价值的学术著作。但在当时，中国或者尚在战乱时期，或者尚在建设的探索时期，经济贫穷，文化欠发达，学术著作的印刷数量不多，流传不广，不利于学术交流和明清史研究更深入的发展，故而故宫出版社将多年来明清史专题性研究著作纳入《明清史学术文库》，重新修订再版，力求涵盖民国以来各个时期的学术大家及其代表性著作，目的就在于将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研究著作汇集一起，以此反映明清社会的整体状况，为学者深入研究明清时期的社会状况提供学术平台。

明清两代，时间长达五百多年之久，道路崎岖，变化迅速，人物和事件丰富繁多，是最接近今天现实的历史，生产力已有相

当发展，居于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，社会结构和各种关系已相当复杂，人口众多，经济繁荣，交流频繁，财富充盈，各种事业兴旺发达。至康雍乾时期，中国历史发展到最高峰。但社会中的各个领域存在着缺陷，各种主客观条件尚未具备，整个社会唯以协同推进，阻力重重，举步维艰。所以未能进入近代化的轨道，中国坐失了西方世界在 18 世纪所抓住的社会进步的良好时机，这是中国的不幸，也是我们前几辈先人痛心扼腕、力图奋起直追的动力和原因。今天，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，成绩辉煌，但前途还有许多艰难曲折，需要我们奋斗拼搏，晚近明清历史上先辈们走过的崎岖道路值得我们回顾、反思、探索、研究，以利于后人的继续快步前进。

在中华民国成立以前，明清史虽已编纂了许多重要的档案资料，但研究尚在起步阶段，历史编纂中充斥着对本朝的歌功颂德和对前朝的诋毁。民国以后的明清史研究则有了重大的进步。

其进步主要可举出三个方面：

第一，改变了形而上学和英雄史观，逐渐以社会进步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；改变了停滞不动、堆砌史料、罗列历史事实，不讲究前因和后果，不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，强调英雄创造了历史而忽视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、阶级斗争，不能给人以真实的历史知识的做法。历史是人类进步的活动，是人民群众艰辛创造和英勇斗争的进程。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的基础，而政治、军事、法制、文化、思想都是其上层建筑，将会或早或迟地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。二十世纪初进步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出现，大大改变和推动了中国历史研究，明清史研究领域出现了许多高水平的、科学的、实证的明清史著作。

第二，研究领域的扩大。自民国以来，明清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，不仅着重于帝王将相活动，不仅有内外战争、官场升贬、刑律惩治，也不仅宣扬封建的纲常伦理，还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

典章制度、兴废沿革、官阶序列、财政收支、赋税征收，人口的增减迁移，城镇的设置变迁；经济方面有农林牧副各业的状况，开垦和耕作记录，各种传统的手工业和商业，以至近代工厂、矿场的兴起，电报的设置，火车轮船的建造；军事方面，有八旗、绿营、团练、湘军、淮军以至北洋水师、小站练兵等；文化方面，既有诗文词赋、绘画书法、人物传记，又有昆曲、京剧、小说、唱本各种民间艺术；加之民族、法制、科学、宗教、城市、乡镇、风俗习惯、生态海洋等方面。各种研究无所不包，覆盖了各个社会历史领域，使得每朝的史书类似于百科全书型的著作，可以阅读和寻找到各种各样的知识。

第三，史料的整理和发展大为进步。民国以后，大内档案公之于世，其数量达一千万件以上，其中尤以清朝的档案与史料为多，它们的大量公开出版为后人提供了无穷的研究宝藏。档案和各种史料是认识和研究历史的重要载体，只有对它进行积累、分析、辨识、考证，才能揭示出历史的真相。近百年来，收集、保存、整理和利用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取得了很大的成绩，使我们对五百多年的明清历史有了许多新的重要的发现和认识。

故宫出版社作为故宫博物院的下属部门，把服务和促进明清史和故宫学研究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义务，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，坚持资助出版《明清史论丛》，还抽出人力、物力出版了《明代宫廷史研究丛书》等一批颇具特色的明清史著作，逐渐成为明清史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的出版阵地，为明清史研究的深入发展，作出了积极贡献。相信本丛书的出版，无论对史学工作者还是普通的史学爱好者，都是一个极大的便利，必将对明清史学术知识和研究的深入发展与广度普及，产生积极的影响。

戴逸

2012年7月

目 录

- 顺治遗诏与清初权力斗争 / 1
- 从清初权力斗争疑多尔袞非正常死亡 / 12
- 清代前期历史中的几个问题 / 27
- 从承德避暑山庄看康雍乾三世的忧患意识 / 51
- 扼杀戊戌变法推行新政的慈禧 / 67
- 戊戌变法史研究的新突破——读孔祥吉同志的两本新书 / 81
- 明清租佃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 / 85
- 清代社会各阶级处理主佃矛盾的对策 / 112
- 清初档案确证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山 / 160
- “奉天玉诏”铜牌真伪之辨 / 167
- 李自成禅隐夹山寺仅仅是个传说
——《中国文物地图集·湖南分册》读后 / 185
- 洪秀全与《劝世良言》 / 201
- 如何看待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 / 214
- 只有农民战争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吗？ / 236
- 依然是警钟——重读《甲申三百年祭》 / 250
- 马戛尔尼“谢恩信”和“跪拜如仪”质疑 / 266
- 厦门庚子海战引发的思考 / 285

中日甲午战争反思录 / 299

清初科场案研究 / 311

清代前期科举取士的兴废之争 / 341

科举制度与儿童教育 / 365

浅议晚清留学生考试 / 374

钱士昇和他的《赐馀堂集》 / 387

尽瘁国是的实业家张謇 / 408

赵尔巽与中国古典史学的终结 / 419

傅斯年与明清档案 / 434

明清纪元简表 / 447

编后说明 / 448

顺治遗诏与清初权力斗争

顺治皇帝是否出家，是清初三大纲案之一。顺治遗诏则是疑案中的一个疑案。对遗诏的研究，与顺治皇帝是否出家有关。

关于顺治帝出家之说，是以吴梅村的《清凉山赞佛诗》为主要依据，加上其他一些旁证，认为顺治帝因董鄂妃之死，哀丧至极，遂厌弃帝位，遁迹空门。如果顺治皇帝并非死于帝位，那就根本不存在什么遗诏。传世的所谓顺治遗诏，就是彻头彻尾的伪造。关于顺治帝是否出家的问题，前人已有详细考证，其中以孟森和陈垣两先生的考证¹最有说服力。两先生的结论基本相同，大意是：顺治好佛，出家之说，不尽无稽，不过出家未遂而已。如果依据王熙自编《年谱》、张宸的《杂记》《清圣祖实录》等书的记载，则可以认定，顺治帝死于天花，而不是遁迹空门。对此，孟森先生论之甚详²，我认为是可信的。

剩下的问题是对顺治遗诏怎么看？根据王熙自编《年谱》《清圣祖实录》、康熙朝《东华录》的记载，遗诏是由顺治帝口授，王熙撰拟的。特别是王熙在自编年谱中，对撰拟遗诏的过程，记述得细致入微，按说是最可信的。但仍给后人留下许多疑点。孟

1 孟森：《世祖出家事考实》，《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》，第216～247页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。下同。陈垣：《汤若望与木陈忞》《语录与顺治宫廷》《顺治皇帝出家》，《陈垣学术论文集》第1集，中华书局，1980年。

2 孟森：《世祖出家事考实》，《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》，第216～247页。

森认为“遗诏既云奏知皇太后而后宣示，则可知其实受成于太后之意旨。”“王熙之撰诏，大半为太后、辅臣之指。”¹其实，遗诏之可疑，远不止此。王熙记述的撰拟遗诏的情景，虽然绘声绘色，但其真实性是大可怀疑的。

根据王熙的描绘，福临死前，即顺治十八年正月最初几天是这样的：

初一日，“因不行庆贺礼，黎明入内，恭请圣安。召入养心殿，赐坐赐茶而退。”

初二日，“入内请安，晚始出。”

初三日，“召入养心殿，上坐御榻，命至榻前讲论移时。是日奉天语面谕者关系重大，并前此屡有面奏，及奉谕询问密封奏折，俱不敢载。”

初六日，“三鼓奉召入养心殿，谕：‘朕患痘，势将不起，尔可详听朕言，速撰诏书，即就榻前书写。’……随勉强拭泪吞声，就御前书就诏书首段，随奏明恐过劳圣体，容臣奉过面谕，详细拟就进呈。遂出于乾清门下西围屏内撰拟。凡三次进览，三蒙钦定，日入时始完。至夜，圣驾宾天，泣血哀恸。”²另一位“守制禁中凡二十七日”的张宸记载顺治帝宾天前后几天的情形如下：

正月初二日，“上幸悯忠寺观内珰吴良辅祝发。”

初四日，“九卿大臣问安，始知上不豫。”

初五日，“又问安，见宫殿各门所悬门神对联尽去。一中贵向各臣耳语甚仓惶。”

初七日“晚释刑狱诸囚一空……传谕民间毋炒豆，毋燃灯，

1 孟森：《世祖出家事实》，《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》，第226、228页。

2 王熙：《王文靖公集》自编《年谱》，清刊本。乾隆帝下诏征集天下图书时，《王文靖公集》曾由直隶总督采进，但未被编入《四库全书》。可能是因为其中有些记载，不合官书基调。

毋泼水，始知上疾为出痘。”¹

《清实录》全文记载了顺治遗诏，但对顺治皇帝之病之死，寥寥数语，一笔带过。据各项公私记载，均未提及召太医诊治，也无宗室大臣问安。弥留之际，只有满汉学士侍侧。遗诏如此苛责，病榻前如此冷清，均出常理之外。

在王熙、张宸的这些记载中，需要研究的有如下几点：

第一，初三日以前尚未发病，与《清实录》、康熙朝《东华录》不同。

第二，顺治皇帝初二日赴悯忠寺观吴良辅祝发，初三日还很健谈，健康状况正常。

第三，初四日突然发病。

第四，初七日凌晨驾崩，从发病至驾崩，前后只有三天。

第五，顺治皇帝患的是天花，各书记载一致。

第六，遗诏由顺治皇帝口授，王熙撰拟，经顺治帝过目。“三次进览，三蒙钦定”。

第七，初六日晚完成遗诏，子夜圣驾宾天。这就是说，遗诏是在驾崩前几个时辰完成的。

把以上几点归纳一下，便在我们面前出现了如下的问题：一个异常严重的天花病患者，能否在他临终前口授并三次斟酌、三次修改一份千余字的文稿呢？我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。

天花，古称痘疮，现在已经绝迹，但在过去是死亡率很高的急性病毒性传染病。天花具有各种不同的类型。不论何种类型，一般情况下，都会发烧，两天后出现皮疹。重型患者，发病来势凶猛，体温迅速上升，高达 40℃，出现全身症状，二至四日皮疹出现，由头面延及全身。还有一种极重型的病人，发病更为凶猛，持续高烧，短期内出现严重衰竭状态，神志昏迷或谵妄，这种极

1 张宸：《平圃遗稿》卷一四《杂记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抄本。下同。

重型的病人大约五六天内死亡。顺治皇帝发病后三天便死亡，说明他是罕见的极重型天花病患者，病情是异乎寻常的严重。即使退一步，按《清实录》的说法，“壬子（初二日），上不豫”，“丁巳（初七日）夜子刻，上崩于养心殿。”¹从发病到死亡，前后也只有五天。这也足以说明顺治皇帝患的是极重型天花，非一般天花可比。患病三五天便死亡的极重型天花病患者，肯定是卧床不起，持续高烧，神志昏迷或谵妄。

康熙年间著名的医学家张璐在他的医学名著——《医通》中，是这样描述天花病人的症状的：

“烦躁狂闷，昏睡自汗。”

“骤发壮热，如火薰灸。头面俱赤，闷热昏眩，狂躁不定。”

“如一发热，即报点如丹，身热如烙……或发热时，便头项不能举，痰喘气急，或目闭神昏，眩晕颠仆，闷乱搐搦。”

“痘疮成浆之时，精神倦怠，神思昏沉，不省人事，呼之不应，自语呢喃，如邪祟状。”

还有其他大量类似的描述，散见该书各处。如：“昏睡不省。”“若痂不落，反见昏沉，不省人事。”“热毒内攻，神昏闷乱。”“壮热不省。”“闷乱昏睡。”“发热肢冷，昏睡少食，痰多气促，寒颤咬牙。”等等。²

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古代医学都告诉我们，极重型天花病人在发病期间持续高烧、不省人事。得了如此重病的顺治皇帝，根本不可能有逻辑严密的思维活动，根本不可能清醒地回顾亲政后十年来的成败得失，根本不可能正常考虑皇太子和辅政大臣的人选。因此我认为，王熙所说的“三次进览，三蒙钦定”是不可信的。所谓的顺治遗诏，既不是顺治帝口授，也未经他过目，是在他不省人事的

1 《清世祖实录》卷一四四，顺治十八年正月壬子、丁巳。

2 张璐：《张氏医通》卷一二《丹溪参补陈氏痘疹论》《发热》《痘疹握机论》《昏沉》等，上海锦章书局。